

(二)轉口港時期 (1860-1950年代初期)

香港作為一個轉口港的地位，從其確立以至完成，並向工業化城市的轉變，經歷了將近100年的時間。為了敘述方便，我們以1898年英國強租新界為標誌，將這一時期劃分為前後的兩個階段。

1.第一階段(1860-1898年)

1860年10月24日，英國政府通過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強迫清政府簽訂了《北京條約》，割佔了南九龍。從此，自南九龍至港島間的廣闊水域置於英國的實際佔領下，這對於香港的轉口貿易地位是至關重要的。

從國際範圍看，這時歐美國家已經先後完成或正在進行產業革命，資產階級正在進行全球性的掠奪與競爭。在這一時期，有兩件事情對於香港轉口港地位的確立產生了重大的影響，這就是蘇伊士運河的通航和有線電報的鋪設。

1896年，蘇伊士運河正式通航，這使得從西歐到香港之間的航程比繞道非洲好望角縮短了5,000公里以上，歐洲來港航線方便多了。1871年，歐洲的有線電報直通香港，並同時與上海、新加坡直接通報，香港與世界各地的聯系更加密切了。

但是，在整個60年代，香港經濟卻面臨著新的衝擊。由於上海港的崛起，香港已經退居第二位，在1856-1866年的10年間，上海的貿易額從993,304鎊激增至4,210,947鎊，而香港和黃埔的貿易額僅從927,067鎊增至1,351,958鎊。不過，從香港本身發展的絕對數字來看，速度也還是相當可觀的。1870年香港進出港船隻達到4,791艘，總重量為2,640,347噸，比1860年分別增長50%。

19世紀60年代香港經濟發展中的一個重標誌就是銀行業的建立。1865年，匯豐銀行正式在港開業，這是總行設在中國的第一家外國銀行。該行創辦初期包括有英、美、德、印度等股份，但主要的投資和創辦人則是在遠東多年的英國大洋行。在此以前在港開設的銀行已有東方銀行(1845)、有利銀行(1857)、渣打銀行(1859)、印度商業銀行、阿格拉聯合服務銀行、西印度中央銀行(1863)等6家。但匯豐後來居上，在港英當局的支持下，吸收存款，發行紙幣，抑制華資，控制中國的對外貿易，壟斷國際匯兌，為外資在華企業提供資金，等等，在香港的經濟活動中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

進入七、八十年代以後，香港已經完全奠定了其轉口港地位，據1880年中國海關統計，中國的輸入總值，香港佔21%，輸出總值則佔37%。另據有關資料統

計，1880年香港進出港船隻為5,775艘，總重量為5,078,868噸，1890年則達到8,219艘和9,771,743噸，10年間分別增加了42%和92%。在發展貿易的同時，香港也陸續發展自己的工業，如船塢、火柴、肥皂、製纜、製糖、水泥行業，但規模都還比較小。

在此期間，華商的財富迅速膨脹。70年代末，港督軒尼詩就曾在立法局表示，華人已成為港島的最大業主，港府的稅收有90%來自華人；1881年他又透露，香港每季繳地稅1,000元的業主18人中，除怡和洋行一家外，餘17人均為華人。政治上，華人也開始崛起。1880年，伍廷芳出任立法局議員，這是華人在該局任職之始。其後，黃勝(1884)，何啟(1890)等人都先後出任立法局議員。隨後華人在港政治、經濟勢力的崛起，為了建立統一的華裔組織，1896年成立了第一個華商社團——中華會館(即現“香港中華總商會”前身，擔負起“聯鄉誼而通商情”的作用。中華會館的成立標誌著華商已經形成一支在政治、經濟上不容忽視的力量。1894年8月23日，英殖民地大臣里本曾對港督羅便臣說：“在英政府保護下，香港已變成一個華人社會而不是英人社會……而華人居留地從來是香港繁榮的一個重要力量。”

1860年英國割佔了南九龍後，港島與九龍形成了彼此相望的“雙城”。通過辟山填海和伸展，港島方面由堅尼地城到鰂魚涌，九龍方面則由油麻地到大角咀、紅磡、馬頭角，都填海建成商業區。居民也從1860年的95,000人(其中外國居民2500人)，增至1898年的254,400人(其中外國居民15,190人)。經過將近40年(1860-1898)的發展，香港最終確立了其轉口港的地位並得到了一定的發展，管理、銀行、保險、船運等方面的服務隨之興起。1898年6月9日英國政府又強迫清政府簽訂了《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強行租借新界。以此為標誌，香港經濟的發展進入了轉口港時期的第二階段。

2· 第二階段(1898-1950)

新界，擁有975.1平方公里以及廣闊的水域。英國強租新界之後，使香港原有的陸地面積(包括港島和九龍司)驟增11倍之多，為香港後來的經濟發展特別是工業提供了重要的條件。過去地處邊界的油麻地、旺角等變為中心地區，70年代以後興起的新市鎮，也全部分佈在新界的九龍半島上。原來聚居在新界400多個村莊的100,000居民，也使人口驟增1/3以上。

香港的發展在這50多年(1898-1950年代初期)中，出現了大起大落的變化，先後經受了兩次世界大戰的衝擊和世界性經濟危機的影響，直到20世紀40年代後半期才得以重建香港的經濟秩序並逐步完成向工業化時期的過渡。

在英租新界後的最初10多年中，香港經濟仍有較快的發展，轉口港的地位得到進一步的加強。1911年，對後來香港經濟發展有重大影響的廣九鐵路全線通車，內地輸港貨物由此一部份可以通過鐵路直接抵港。另一方面，來港船隻與轉口貨物也有較大增加，1914年達到創紀錄的23,740艘，載重總噸位達22,069,878噸，分別比1898年增加了115%和66%。同時，香港政府的稅收也有較大幅度的增加，如戰前的1913年為8,512,308元，比1898年的2,918,159元增長了近2倍。

1914-1918年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英國是主要參戰國之一，因此香港間接處於戰爭狀態之下。在大戰的四年間，香港的轉口貿易大致上處於停滯狀況，甚至略有下降，直至戰後的第二年還未能恢復到戰前1913年的水平，這種連續幾年徘徊不前的情況是英佔香港以來所首次出現的。但是，香港的造船業卻利用歐美船隻因大戰而減少的空隙，大力加以發展，黃埔、太古以及海軍船塢，相繼走上了造船、修船的“黃金時代”，並在戰後維持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香港積極利用歐洲工業衰疲的空檔，開拓國際市場，經濟發展漸趨平穩。至1924年，進出港總噸位已達35,471,671噸，比戰前最高年份1913年增長了55%。此後，由於爆發了省港大罷工，香港的進出口貿易、工業等方面均一度受到影響，至1927年後才漸有恢復。據統計，1930年香港對外貿易總值為81,300萬元，比1921年的43,260萬元增長了88%。

20世紀30年代初期，爆發了長達4年之久的世界性經濟危機，世界貿易額減少了2/3，香港也受到了嚴重的衝擊，港元暴跌，每元僅值1先令左右。從香港的對外貿易總值看，整個30年代貿易額大致維持在10億元左右，其中以1935年為最低點。但是，香港的工業發展卻從30年代開始漸有起色。1936年，香港啟德機場投入民用，這對後來香港經濟的發展有很大的作用。

1932年，英聯邦在加拿大渥太華開會，討論了英聯邦特惠稅協定，規定凡是採用聯邦原料或勞工至少50%的製成品，可在英國及其自治領市場享受特惠稅待遇。香港於1934年加入該協定。此舉對香港工業的發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至1940年，在港設立的工廠約有800家，僱用工人約3萬名，主要有造船、棉織、膠鞋、電筒、罐頭食品等行業。這對50年代香港工業的重建有積極影響。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於12月26日攻佔香港，直至1945年8月15日投降為止，香港經歷了3年又8個月的日佔時期。在此期間，日軍實行了野蠻的法西斯統治，摧毀了戰前所建立起來的大部份工業，至1946年，工廠數目急劇下降為366家，外貿基本處於停頓狀態，房屋被毀達19,000單位，居民被強迫遣散回鄉。全港人口從1941年的160萬銳減至1945年8月的60萬。

戰後的香港，一片廢墟，紙幣貶值，資產凍結，企業家和技術人員嚴重缺乏，情況十分惡劣。但是，華人資本迅速返回，內地的人才、資金、設備等大量流入香港；香港與東南亞、英、美、澳、加等國家和地區的經濟聯繫逐步得到恢復和加強。同時，英方也採取了一些比較明智的措施，例如匯豐銀行宣佈承認日佔時期發行的“迫簽紙幣”(DURESS NOTES)，恢復信譽，銀行和外匯業務逐步恢復常態。至1947年，香港進出口貿易總值增至27.67億元，比戰前最高年份的1931年的12.8億元增長了116%，1949年更是突破50億大關，達到50.69億元。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英國採取了明智的行動，在西方國家中率先承認。港商迅速充當了新中國與外界貿易往來的中介人。1951年香港的對外貿易總值激增至創紀錄的93.03億元，中國佔港總貿易額的26.5%，達到24.67億元，其中中國佔港總進口的17.7%，佔港產品出口(包括轉口)的36.2%，均居第一位。這是香港轉口貿易的鼎盛時期，香港經濟也得以迅速恢復。

在這短短幾年中，香港經濟之所以得到迅速恢復，主要原因顯然是由於對中國大陸的轉口貿易所帶動。此外，戰後人口也迅速增加，1947年便超過戰前的水平，達到180萬人，1950年達到206萬人，為香港的經濟發展提供了豐富的勞動力資源。

但是好景不常，香港經濟很快又受到一次嚴重的打擊：1951年朝鮮戰爭爆發以後，帝國主義蓄意與中國為敵，對華實行禁運。戰後剛剛恢復和發展起來的香港轉口貿易便一落千丈，1952年對外貿易總值急劇下降到66.78億元，比上一年銳減26.5億元，幾乎減少了1/3。同年對大陸的輸出也從上一年的16.04億元降為5.20億元。此後，香港的進出口貿易連續三年下降，經濟前景岌岌可危。香港經濟向何處去？這是進入50年代以後所急待解決的問題。